



售總總發書服化文國中

記登請星

論評期星

角一售零册每 期四第 編主士英劉

嚴防敵人盜棉

我國是個產棉的國家，其產量之多，現占世界第三。這種成績之能造成，乃是我們最近數年來努力的結果。在民國二十年，我們運進口了二百八十萬公担的棉花，可是到了民國二十五年，進口的棉花（四十萬公担）便只比那出口的（三十六萬公担）多出四萬公担了。所以民國二十五年可以說是我國棉花開始自給的一年。從此以後，我們所產的棉花，除由老百姓自己留用外，還可供給國內一四二家紗廠的需要。

可是敵國的情形與此大不相同。他們的棉紡織業雖是一種最發達的工業，在輕工業中首屈一指，一九三七年輸出棉織品總值五萬七千三百萬元，翌年輸出亦值四萬零四百萬元，均在出口貨中位佔第一，就是生絲也趕不上它，可是他們所需的原料，多從美國、印度、埃及等處輸入。我國在抗戰以前也供給了他一點棉花，但數量不大，在民國廿五與廿六兩年都在二十五萬公担左右。敵國棉紡織業的基礎薄弱，由此可以看出。假如英美兩國同時對它停止棉花輸出，它的棉紡織業就要受到致命打擊！

日本的作戰資源，一大部份是要仰給於外國的。如果英美對日真正實行禁運棉花政策，日本許多棉紡織廠就要停工，許多工人就要失業，因而就無棉織品之輸出，因而絕其換取外國以購作戰資源之重要門路，那麼它的對華戰爭，勢必至於無法支持的。

敵人當然早就感覺到了本身有這弱點，所以它在佔據華北之後，就把華北當作它的棉花庫。在不久以前，敵人還擬了一個計劃，想使華北的棉產增至一千萬公担，同時對於華北棉花的搜括，也是無所不用其極。抗戰發生以後的第二年（二十七年），敵人由我淪陷區內盜去的棉花，已由二十三萬公担增至九十六萬公担，其中八十二萬公担是山天津運出的。這是一個極其可怕的趨勢，如果聽它繼續下去，那麼敵人的棉紡織業，不必依靠英美接濟原料，也能支持下去。

所以我們目前的任務，就是嚴密看守我國的棉花，毋令敵人盜去！這種工作，在華北更要努力。有幾件事可以立刻動手的。第一是少種棉花，多種敵人所不親的農作物，如玉米與高粱之類。第二是推廣工業合作，利用當地所產棉花織成土布，以供當地人民消費。第三是把當地剩餘的棉花，儘量運到後方。第四就是嚴密監視奸商的行動。

敵人在華北只佔據了點和線，而在這些點和線上是不出產棉花的。敵人現在就是利用一些奸商，叫他們去下鄉搜集棉花，運到都市裏面，轉運赴日。所以我們如能提高華北軍民之警覺性，在封鎖線上嚴密注意，不使一朵棉花流入敵人手裏，那麼，敵人的設計終必失敗於我們的手裏。看守我們的棉花，毋使資敵，這是每一個中華民國的兒女，所應恪盡的天職！（吳景超）

號三四二第路查審市設 版出社論評期星 日六月二十年九十二國民

南京圖書總發行

德義日協定與中日戰局的前途

吳之椿

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與一九四〇年的德義日協定，同是具有世界性的軍事協定。英日同盟經過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一年兩次加強與續訂，其影響之影響現已成爲一般週知之事實。日俄戰役後日本之崛起，及上次歐戰時英帝國之勝利，皆曾直接的或間接的蒙受英日同盟之賜。故謂二十世紀初期三十年的世界形勢，一部份係由英日同盟所造成，殆非過辭。今日吾人復遭逢着性質近似而影響或尤爲遠大之另一軍事協定，即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德義日三國所成立的協定。此項協定在世界政治上所發生之影響，固然猶有待乎事實之證明，但自協定宣佈以後其在列強方面所引起之重大反應觀之，則德義日協定之結果，在不遠之將來，勢將產生一種新之世界形勢，恐已無可避免。將來新世界形勢之成立，其因素極其複雜，但吾人今日已可略窺見德義日同盟必爲其中之一決定因素。在任何世界形勢之下，中國所受之影響必然直接而深刻。中國對於英日同盟曾經痛切之經驗。在德義日協定所產生的國際局勢之下，中國將何以自處——這是我們應當及早深思熟慮求兩端之國家大計。

就中國方面說，中華民國的歷史到現在爲止，是存在於英日同盟與德義日協定之間；這兩種協定在中國的近史上，都是劃時代的事件。英日同盟，就大體上說，是中國這一段歷史的開始。德義日協定，是中國這一段歷史的結束，至少我們必須努力做到這樣的地步。中華民國短短的三十年的歷史，充滿了富有曲折的生命，其間經過了無數次的失敗，頓挫，興衰與成功。在此期間，中國的命運之降升，幾乎無不直接或間接接受了中日關係的影響，亦即直接或間接接受了英日同盟的勢力所牽掣。中日關係的痛痛經驗，中國每一國民現在都領略過；這種痛痛經驗由英日同盟所賜予的。如果沒有英日同盟，決不會有二十世紀的日本，亦決不會有二十世紀的中日關係，而中國的命運的發展，

亦勢必趨着另一個途徑。這種論斷雖近於事後的問題，然一經按實，自二十一條，而九一八，而七七抗戰，外交之影響內政，沒有比這一段歷史更顯明而有力的。對於英日同盟，中國方面有二事值得注意。其一，中國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其二，中國當時未嘗了解英日同盟對於中國本身的前途，將發生嚴重的影響。中國對於英日同盟，不但無籌策于已事，亦且對於不可捉摸的世界政治勢力之消長，未曾企圖予以分析與把握。及至英日同盟所專與之日本勢力已經長成爲強大，中國已成爲其犧牲之對象，欲求竭力加以抵抗，其勢遂感竭蹶。此乃中國三十年來對於日本之交涉，亦實對於英日同盟之掙扎之實際情形。此種演變爲吾人當時始料所不及，應爲吾國今後外交之重大警戒。

德義日同盟對於中國究將發生何種的影響？今日欲以一言作一肯定之答復，殊難過早。列強對之雖已明白表示其堅強之反應，但吾人今日實難根據可以預言對於日本必然演成一種悲劇。就今日列強之威大措施觀之，已行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然越過此種程度之預言，固然屬於武斷。無論目前之國際局勢隨至若干時日，以及今後之演變發生何種結果，中國如欲免於類似英日同盟之慘禍或臨己身，則必對於德義日同盟之演進，加以特別密切之注意，而不務採取袖手旁觀之態度，或抱持漠不關心，希圖俾免之心理。德義日協定除提及中日爭端以外，在約文的規定內，不涉及中國；而締約之對象爲美國，又爲世界所週知之事。就表面看，可謂與中國甚少相涉；但今日如果倘有人抱此反相之論，其人數量亦甚少。國際政治之內果關係，往往間接成偶或者這較直接或意中者爲重大。英日同盟之於中國，已有前例在先；德義日協定之於中國，無人能保證不發生連較英日同盟尤爲重大之影響。其惟一在中之保證，在乎中國確立善處之道而努力以赴。外交之功用從不在乎以最低之代價換取最大之報酬，此乃投機之事耳。但如何處

其大之努力，對於基本國策；使國際間不利之環境變為有利，或至少使不利之情形盡量減輕，以免除基本國策之障礙；此乃中國對德義日協定所必須採取之態度。中國對日關係之基本國策，如欲以一貫概括說明，即是因英日同盟而養成之日本政治優勢必須加以摧毀，而代以基於國際自由平等之新秩序。在現在的情形之下，中日之不能兩立，已經成爲堅定不移之信念。此種信念之在中國，經過三年餘之血戰，愈益堅定。此種血戰，犧牲不可謂不大，代價不可謂不高。如因此種犧牲與代價而獲致上項國策之貫徹，則犧牲方爲不虛。在七七事變初起之時，或甚至在南京撤退或漢口撤退之時，中國所要求者，爲日方暫時縮手，俾中國得有喘息以圖恢復之機會。中國當時之態度，可以委曲求全，字盡之。故當時日方所提之休戰條件，只須中國認爲最低限度可許之而求全，無不願意委曲承受。日方既決不肯予中國以可以求全之機會，中國自亦無所用其委曲。此種情形，恰如長戰爭，而中國準備爲更大之流血以外，別無解決之途；亦正以證明中日之不能兩立，與中國所採取之委曲求全之態度，不生實效。中國如欲解決中日關係，勢不能不放棄委曲求全之態度，而另定一如上述之基本國策，即根本取消日本之政治優勢。事實上中國對於委曲求全之態度，早已放棄；而對於根本取消日本政治優勢之國策，正在積極於敵我勢力懸殊與國際情勢極端動盪之下，而未敢輕於過信自己之實力果能貫徹。適於此時而有德義日三國協定之公佈。

德義日協定對於歐洲戰事之影響姑不具論。僅就其對東亞而言，實爲自英日同盟之後數十年來僅有之一等重要國際協定。關於東亞大局，國際間曾經有過種種協定，其最著名者如九國公約。吾人測驗某種國際協定具有何等之重要性，要當視其能否對於現存之國際形勢爲有效之變更，或禍成福。持此標準以觀，則九國公約實未能對於東亞局勢爲有效之變更。九國公約以後，日本之跋扈猶昔，其政治上之優勢並未因之而動搖。故近數年以來涉及東亞之一等重要協定，在以前只有英日同盟；在今日及以將將爲德義日協定。此項協定公佈以後，其重要之反響可得而言者，在日本爲其與外，大臣公開發表對美挑戰之言論；在美國則爲軍備之加緊進行，羅斯福總統所主持之對日堅決措施與對中國之增加援助，因其第三次之當選繼任，證明確有愛國人民之擁護；在英國則爲漢蘆公路之重開；在中國則爲自開戰以來日軍首次自重要城市如南甯之撤退，及屯軍於海南島。綜觀上述各節，吾人可以歸納言之，德義日協定對於東亞局勢之重要計有三端。其一，日美早已惡化之關係，至此折斷任何改善之橋樑，而進入於戰爭前夕之狀態。日美如果發生戰爭，其因素甚多，其中不能謂其全不涉及中國。僅就日美及中國方面而言，則屬於心理者遠較屬於事實與法律者爲大。美國之不致爲九國公約所獨與日本作戰，早極顯明；其在中國之條約權益所受之損害，美國一部份之輿論始終認爲不值得一戰之犧牲，而希望以談判之方式，獲得糾正與補償。美國大多數人民厭惡戰爭。至德義日協定公佈之後，此種厭惡戰爭之心理已經掃除無遺。美國人民方始恍然於戰爭之不可避免，而堅決勇敢從事於戰爭之準備。羅斯福之第三次聯任總統，可以視爲此種準備之鮮明的表示；而德義日協定實爲促成羅斯福就選成功之一大助力。其二，英法自英日同盟以後，關於中國方面，歷來採取一貫的對日妥協政策。自九一八以來，此種妥協政策始終未變。中國歷來對日交涉所受之屈辱與損失，其大部份之責任應歸於英法對日之妥協政策，九一八僅其一例耳。廿餘年來英日同盟雖然在名義上已經取消，但凡涉及中國之問題，其精神則依然附屬於此妥協政策。四十年來英國有關中國之對日政策，在大體上極少變更；最近尙有封閉漢蘆公路三個月之舉，亦可視爲此項政策最後之迴光反照。及至德義日三國協定公佈，日本公認宣佈與其死敵訂立軍事同盟，英國乃不得不放棄其傳統的對日妥協政策。漢蘆公路之重開，不僅有關於中國軍事之運輸，實亦徵象英國在遠東對日政策之重大改變。英日同盟在中國方面所孕育之時代，事實上至德義日協定公佈之日，永遠告一結束。其三，德義日協定在事實上使中英美有立於同一戰線的可能，且已造成其同一戰線的趨勢。在中日關係上，歷來英美兩國採取不同之立場與各異之方針。大體言之，美國的政策趨於堅決，英國的政策趨於妥協；此兩種不同之政策，（下接第十三頁）

言論；在美國則爲軍備之加緊進行，羅斯福總統所主持之對日堅決措施與對中國之增加援助，因其第三次之當選繼任，證明確有愛國人民之擁護；在英國則爲漢蘆公路之重開；在中國則爲自開戰以來日軍首次自重要城市如南甯之撤退，及屯軍於海南島。綜觀上述各節，吾人可以歸納言之，德義日協定對於東亞局勢之重要計有三端。其一，日美早已惡化之關係，至此折斷任何改善之橋樑，而進入於戰爭前夕之狀態。日美如果發生戰爭，其因素甚多，其中不能謂其全不涉及中國。僅就日美及中國方面而言，則屬於心理者遠較屬於事實與法律者爲大。美國之不致爲九國公約所獨與日本作戰，早極顯明；其在中國之條約權益所受之損害，美國一部份之輿論始終認爲不值得一戰之犧牲，而希望以談判之方式，獲得糾正與補償。美國大多數人民厭惡戰爭。至德義日協定公佈之後，此種厭惡戰爭之心理已經掃除無遺。美國人民方始恍然於戰爭之不可避免，而堅決勇敢從事於戰爭之準備。羅斯福之第三次聯任總統，可以視爲此種準備之鮮明的表示；而德義日協定實爲促成羅斯福就選成功之一大助力。其二，英法自英日同盟以後，關於中國方面，歷來採取一貫的對日妥協政策。自九一八以來，此種妥協政策始終未變。中國歷來對日交涉所受之屈辱與損失，其大部份之責任應歸於英法對日之妥協政策，九一八僅其一例耳。廿餘年來英日同盟雖然在名義上已經取消，但凡涉及中國之問題，其精神則依然附屬於此妥協政策。四十年來英國有關中國之對日政策，在大體上極少變更；最近尙有封閉漢蘆公路三個月之舉，亦可視爲此項政策最後之迴光反照。及至德義日三國協定公佈，日本公認宣佈與其死敵訂立軍事同盟，英國乃不得不放棄其傳統的對日妥協政策。漢蘆公路之重開，不僅有關於中國軍事之運輸，實亦徵象英國在遠東對日政策之重大改變。英日同盟在中國方面所孕育之時代，事實上至德義日協定公佈之日，永遠告一結束。其三，德義日協定在事實上使中英美有立於同一戰線的可能，且已造成其同一戰線的趨勢。在中日關係上，歷來英美兩國採取不同之立場與各異之方針。大體言之，美國的政策趨於堅決，英國的政策趨於妥協；此兩種不同之政策，（下接第十三頁）

論國策與民主

張匯文

自從法國因戰式的投降德國以後，國內有幾個過於敏感而少理解力的人以爲法國的失敗就是民主政治的失敗，於是明唱暗和的想把中國拉上這條路上去，這是一種極不合於邏輯而有危險性的論調。

這種個人的根本錯誤是在假定不對和因果顛倒。他們的假定和推測——如果有的話——總不出以下的格式：第一，他們盲目的接受了「民主」的說法，以爲民主制根本不宜於戰時，獨裁制是最有效率而最宜於戰時的。第二，他們想，法國是獨行民主制的國家，現在法國失敗了，德國勝利了，這足證明上面的假定是對的。第三，他們的結論是：中國是在抗戰時期，爲國勝利，必須排除民主的思想，這獨裁的論調。

固然我們不能否認：不同的政治思想足以形成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治制度足以發生不同程度的效率；政府效率的大小足以影響到戰爭的得失，但是我們不能同時承認戰爭的勝負是完全取決於政府效率的大小；也不能承認政府效率的大小是完全取決於政治制度的差異；更不能承認政治制度的得失可以決定政治思想的價值。

具體點說，法國雖是獨行民主制的國家，而法國現在確是失敗了，這我們不能說，法國的失敗就是民主政治的失敗。因爲第一，吾人通觀中的民主政制不能即以法國的政制爲代表；民主制在法國，雖然已有五十年餘的歷史，但法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始終未能取得密爾和合理的聯繫，以之與英國的民主政治相較，二者雖是同樣獨行內閣制度，然而成效則大相逕庭，兩國人民雖是同樣醉心於自由平等的思想，但英國的自由平等思想是已溶化於法治精神，納入了法治軌道，形成了一種自然運用的制度，而在法國則仍是散漫無章，距此標準尚遠。第二，法國的失敗是國策國力的失敗，不是政治制度的失敗，更不是政治思想的失敗。單從政府效率一方面說，我們固難否認法國政府的運

用，因爲政治上的多黨糾紛，和行政上的缺乏「集約」，遠不及德國的敏捷靈活，這多少影響到戰爭的結果，但是我們當認清，假使政府效率是使法國失敗的因素之一，那末我敢斷言，它絕不是一個決定性因素，而不過是一個不甚重要的因素。這是不難解釋明白的，因爲法國用同樣的制度和同樣的政府，在過去也曾作戰勝利過的。說到法國的失敗是國策國力的失敗一點，本是一個很值得另作詳細討論的問題，在此，我僅將國策上的基本錯誤指出，至於國力的失敗，在戰場上已經充分的表現出來，不再贅言。國策的失敗，而單說，就是因爲法國的國策是消極的而非積極的，所以造成今日之局面。百餘年來，法國對內是時時恐怕專制復活，所以在政治建設上面，特別是制度方面，處處都着眼在防範。譬如多黨制的存在，盧浮宮式的總統，和分散制的行政，都可說是此種防範心理的產物。對外，它又時時恐怕德國的進攻和復仇——特別是從第一次歐戰結束以後，這種心理的表現尤其顯著，在外交方面，它所特別注重的是怎樣壓迫德國履行凡爾賽條約，在軍備方面，它所注重的是如何防禦德國進攻。這種建立在恐懼心理上面的消極國策，實使整個國家失去重心，政府與人民都失去了自信力，由全國的精神渙散而至於整個國家的瓦解，乃爲一種必然的趨勢。由此看來，法國的失敗，絕不是單純的因爲採行民主政治而失敗；即使退一萬步而言，就算民主政治是它失敗的主要原因，我們也不能因此斷定凡是採用民主政治的國家都必遭遇失敗，更不能因此而即宣告民主政治的死刑。

法國的失敗既不是民主政治的失敗，然則民主政治究竟是否宜於戰時？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對此問題，一般人多半是以獨裁制爲根據而作反面答案，因爲獨裁制或性近獨裁制的政府，由平時入於戰時，在機構上可不必多事更張，一個人或少數人運用着一個不負責

任的政府——事權集中，命令劃一，不受任何人的牽制——很可以獨斷獨行，敏捷應付；反之，探行民主制的政府，必屬是一「責任政府」，無論其內閣制或總統制，行政當局必須直接的或間接的向人民負責，因而成不免受分權原則的牽制，到了戰時雖免發生統率困難和遲延不靈等問題。對於這種論調，我以為我們不妨承認它的表面上的價值，至於真正價值，還得試作進一步的探討。固然我們不能否認獨裁制在戰時所享受的許多便利，但也不能只看到了這些便利，而忽略它附帶的基本危險。因為獨裁制從不受牽制與不負責任中間，雖可收到較大的效率，然而它的基本危險也正在這裏面。歷史的事實很明顯地告訴我們：第一不負責任和不受牽制的政府作事之際，它的效率是有限度的，而這種限度往往是在兩個條件上的：（一）戰爭不宜持久，（二）戰事的進展必步步順利，不可遭受挫折。換言之，戰事的進展如能步步順利而在短時期內得一結束，則不但這個政府的威信得以維持，而且它的力量可以與日俱增。反之，戰事一旦失利，則其國內的叛變或革命便很容易激起，甚至形成整個政府和國家的崩潰，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初步成功和最後失敗，便是一個很好的先例。

或許有人要說，獨裁制的危險是有，難道民主制就絕對沒有同樣的危險？我對此雖不敢作肯定的回答，但用比較的眼光來看，則絕對的相信：一個真正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政府的設施雖能做到的民意與依賴的程度——在戰爭的進展中，人民對於政府的信賴與擁護，決不會因遭受挫折而減少。反之，一個執行人民意志的政府，自然容易得到人民始終的擁護，一個得到人民擁護的政府，也自然容易事權集中和命令劃一。所以說，民主政治不但可以避免獨裁制所易遭遇的危險，而且在相當情況下可以得到獨裁制所享有的一切便利。

此外，凡對民主政制之效率發生懷疑的人，多半忽視了兩種重要的事實：第一，他們忽視了民主政制本身是可以改進的，而且在事實上也是時時刻刻在那裏改進的。自上次歐戰結束以後，各民主國家，無不根據戰時的經驗，努力改進自身的制度，使其可以隨時應付危機的來臨，各法在憲法上增加緊急命令條款和習慣上不斷的引用議會特別授權

方式，都未始不是民主政治進步的一種表現。因此，如果我們仍用上大歐戰以前的眼光來看今日的民主政治，則未免有失公允。以美國而言，更以政治為例，自從上次歐戰以後，對於總統應付緊急環境的權限，無論在有成或無形中，都增加了許多，「復國法案」的執行，就是一種改進的試驗。同時，美國總統為欲增進其自身的效率起見，又不時的在延聘專家作有系統的研究和改進。一九三七年，羅斯福派一委員會來專門研究行政管理，即是一個好例。時至今日，美國總統應付戰爭的權限，及其可能產生的效率，已經絕非威爾遜時代所能比擬。在這次大選中，羅斯福竟能連任，更足證明這是美國民主政治適應戰時需要的一個重大修正。所以說，今日美國總統的權力，無論在法理上或習慣上，都可使其發生最高效能，如能充分運用，雖與獨裁制作比較，也恐有過之而無不及，無怪希特勒反責羅斯福為「真正的獨裁者」。不過，美國總統的權限雖然如此之大，但仍不失其為民主政制，這也就是民主制較優於獨裁制的另一方面。

懷疑民主政制效能的人所忽視的第三種事實，是當他們觀察一種制度的功能時，往往就該制度的本身去注意，而忽略了該制度所處的環境，更少注意到那環境的變遷與進步。因為一種制度的效能，不能全靠其本身的價值，同時還要考慮到它的許多客觀條件，是否有利於它的運用與推行而決定。以民主制與獨裁制比較而論之，同樣的制度（即同為民主或同為獨裁）在兩個不同的環境中，固然可以發生不同的效率；但是兩種不同的制度（即一為民主一為獨裁）雖在同樣的環境中，也未必發生同樣的效率。幫助決定近代政府效能的客觀條件雖多，但我認為重要的有五個：（一）科學，（二）交通，（三）工業，（四）教育，（五）法治精神。在兩個同時探行民主或同時探行獨裁的國家裏，假使制度本身的價值也是一樣，而在這五個條件的程度具有重大差別時，則二者的制度的運用效能也必因而懸殊。但如兩個國家，在這五個條件上所具有的程度是相等的，而在制度上則一為民主，一為獨裁，在這種情形下，兩者的制度的運用效能究竟誰大？我敢大膽的問答：獨裁制是遠不及民主制的。因為就這五個條件中，獨裁制所能利

獨的僅是頭三個。而民主制則可完全利用。換言之，科學，交通，和工業的發展是利於任何政治制度的推行，但是教育普及，人民的理智力應發達的國家，則愈不利於獨裁制的產生，生長，和推進。至於法治精神，根本上與獨裁水火不相容，有了法治便不會有獨裁，有了獨裁便不會有法治，這是個淺顯的事實。可是，教育與法治即合於民主制的精神，二者的水準愈高，則民主制的效率亦愈大，這也是不待解釋而自明的事實。所以說，從客觀條件的作用來比較，民主制也是較優於獨裁制的。

根據這一點，我們還可以作另一方面的觀察，即客觀條件的變遷與進步對兩種制度的推進速率問題。在前面既已說明，客觀條件對於獨裁效能的推進，民主制是較處於有利的地位，那麼，客觀條件的進步愈快愈大，則民主制的變遷亦必隨之愈大，推進的速率亦必隨之愈高。我想無人能夠否認科學，交通，工業，教育和法治精神都是不斷的在進步中，五十年以前民主政治所處的環境與今日的環境已大不相同了，就是第一次歐戰時的環境也已經不能和今日的相比較。因此，我們對於今日民主制效能的估計，也不能像五十年前一樣，因為它的效能已經隨客觀條件的進步而進步了。由此看來，民主制的本身既可由自身的變遷而改進，又可借客觀條件的進步而連帶進步，則民主制效能的進步實可說是與日俱進。假如我們承認這是一個合理的結論，則我們更可

合理的推斷，在人類進化的前途中，民主制的效能，勢必與時俱進，反之，獨裁制的效能，則將逐日退化。

寫到這裏，忽然想起近人時發一種謬論，就是說：「民主政治在理論上我贊成，但在制度上我反對，特別在戰時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因此我們應該暫時不談民主政治」。發表這種論調的人，如果不是根本不了解民主與獨裁的涵義，便是有意的自欺欺人。民主與獨裁在精神上是背道而馳的，贊成民主思想而要採取獨裁制度，這就和想回南京去而向西康開步一樣。要知獨裁制和強有力的政府並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且我在前面已經證明民主制也可產生極強有力的政府，至在戰時則民主制不惟可以做到力能享受獨裁制在平時所可享受的一切便利之進步，且可免去獨裁制所常遭遇的可能的危險。我以為在抗戰建國時期，我們更應該嚴格遵照國父遺留的國策，向着民主制的大道大步邁進。同時參考各民主國家的經驗，儘量避免民主政制在運用上的缺陷，斷不可因見到別人的失敗，而即放棄自己的立場。何況我們已經證明法國的失敗，並不是失敗於民主政治，而是失敗於沒有國策！沒有國策，就沒有國力，沒有國力，就不能抗敵！

如果我們今日因見法法失敗而即傾向獨裁，明日因見英國勝利而復想回民主，徬徨歧途，猶豫不決，那就等於沒有固定的國策，在這種糾存亡之際，影響太大，深願國人予以嚴重注意！



經濟戰 (續)

第三，政府在戰時必須在可能範圍之內籌集外債。外債的意義是時間空間的調劑。所謂空間的調劑即使邦的生產用於此邦；所謂時間的調劑即把現有的生產消耗於此邦，而以此邦將來的生產償還之。外債如內債，也是近代金融發明的一種集中物資的方法。我們把內債和外債的性質研究清楚了，我們就曉得了解戰時金融實際是玩一籌把戲，那就是集中物資來應戰，時間的集中和空間的集中。

第四，各國戰時政府除了增加稅收及發行內外債外，有時還不能不靠貨幣流通額的增加來應付巨大的戰費。一般經濟學者都認為這是下策。其實，通貨膨脹是戰時不能避免的。在相當範圍之內，通貨膨脹不但無害，而且有益。這個範圍的決定和嚴謹遵守是戰時財政金融最難的問題。一般人缺乏經濟常識，以為政府既能發行鈔票以當通貨，那何妨多發？並且在通貨額初加之際，物價及人工都略微上漲，形成

蔣廷黻

社會的繁榮。一般人不知此中的危險，以為多鈔票就是繁榮經濟的
法寶。於是要求多發鈔票，殊不知一轉瞬間，物價飛漲，鈔票愈多則其
購買力必愈少，終至人民對於鈔票完全喪失信仰。所以在戰爭時期，
超過某種限度，今天追加預算，明天必追加鈔票，後天物價必飛漲，
到了大後天人民就不再受鈔票而囤積物資。超過某種限度，鈔票愈
多，其信用壽命就愈短。等到鈔票無購買力時，那個社會就僵死了。
到了那種田地，繼續作戰是不可能的。

究竟不可超過的限度在那裏？金融家可以推算一國通貨的飽和點
何在，不過這種估計是極專門的事業。大概說來，在戰爭時期物價必
漲，惟經濟家必須使其不暴漲。如在一年之內，物價有百分之十至
二十的增長，還是平常的，不能目為有害無益的，但物價在數星期之
內就加倍，那就超過限度了，惡性膨脹就到了。物價指數是戰時經濟
最須注意的一件事。前次歐洲大戰，法德兩國同有通貨膨脹。在法
國，到了戰爭末日，佛郎仍維持國內及國際的信用。德國則不然，
消耗太大，又無友邦援助，馬克終於貶值至於不可收拾的地步。

有人要說通貨膨脹的惡影響，絕對不能發生於農業國家。這是極
幼稚而且極危險的學說。農業的經濟繁榮，不外運輸通繁，消息不靈
，物價各地不一等等。這些特殊情形能緩和通貨膨脹的惡影響，
絕對不能避免。在工業國家，經濟崩潰是突然的，全國同時的。在
農業國家，經濟崩潰是無形的，區域與區域不同的。但在農業國，
如在工業國，物價的漲落一則受供求比例的支配，二則受通貨額與物資
類比例的支配。若說一個國家因其為農業國，就能避免這種支配，即
等於說物價的原則在地球上某一區域內並不適用——這種觀念祇能在科
學落伍社會中發生！

五 戰時建設不可與戰時經濟背道而馳

我國近年政府與人民都感覺到國內經濟事業的落伍，非大舉建設不
可，於是建設遂成全國戰時經濟運動。凡以建設名向政府請款者既

府下敢不照辦；政府本身亦有建設專款預算，其數字與普通預算相
差無幾。這是一種時潮，在七七事變前已養成。自抗戰以來，政府
復以「一面抗戰一面建國」號召全國，於是文人以「建國」為題，大作
文章；機關也以建國為題，大擬計劃，大編預算，好像以中華民族物力
人力及精神力之偉大，抗戰不過區區小事，我們應該趁機把一切應辦的
事業，在三五年之內都辦完了。西北通蘇聯，西南通緬甸的鐵路，在
平時不敢擬議者，到作戰時間竟試造了。教育普及，而且於五年之內
普及，也見之於政府對參政會的提案，參政會反過來給政府出個難題
要求政府不加取人民負擔。這豈不是開玩笑？青海西康開發的計
劃，西南建設的計劃，川康建設的計劃，在這三年之內，不知道起草過
提議過多少次，雖則至今沒有全體實行，經費已經出了不少，會議開了
無數次，機關也設立了好幾個。

外人中之不明白中國文人習慣，政治空氣和實際經濟情形者，看見
我們這種建設狂，不免有所批評。他們當然是以自己國內的情形來作
他們議論的根據。在英美各國，一到戰爭時期，凡與軍事有關的事業必
停辦或暫停辦，不辦停辦者亦必儘量縮小。英美的人民和政府到了作
戰時期，實實在在的相信「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因此他們的力量和專
志亦集中於軍事和勝利。英美的人民雖知中國的偉大，却不相信中國
的經濟力量超過英美。這種謬論本可置之不理，但有時倒也發生實際
影響。我們向英美談借債的時候，他們或者就有話說了：「你們在
作戰時期能建設二千公里的鐵路，另外又測量五六千公里。你們有編
辦普及教育，每年花六七萬萬亦所不計。你們無須向我們借款」。
中國情形實與英美不同，我們有時不能不把他們的批評置之度外。
第一，他們的建設事業已應有盡有，無須隨時拖佛脚，我們這裏則實
待事，許多鐵路公路及電信事業，為行軍所需者，雖經費很大，我們不
能不一面抗戰，一面建設。第二，在英美，政府無養士的責任；到了
戰時，士大夫不到前線去抗戰，就在後方從事生產，亦無須政府去養他
們。我們所談的建設，一部份是為養士，因為士不得養，大有跑往僑
國境的可能！第三，歐戰是中國士大夫的特長，也是他們回國進身之

種，所以談建設者不免比英美多些。

雖然如此，我們的戰時建設也不可妨礙戰時經濟。我們在前文已經說過，戰時經濟在物資上必求增加生產，減少消耗；在財政金融上，應集中現代及後代的餘資，以應付目前的戰費。我們如果切實了解戰時經濟，那我們就能了解戰時建設所必須遵守的準則。

第一，戰時的建設，無論其性質如何，重要如何，必須在作戰時期內完成而生效，否則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近代戰爭，縱使變為長期的戰爭，亦不能超過三五年；中日甲午之戰，為時僅半年；日俄之戰，不過一年左右；上次大戰亦不過四年零三個月。至於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拿破侖時代二十五六年的戰爭，太平天國時代的十四五年的內戰，都非現代戰爭的猛烈和耗費所難容許。以現代戰爭耗費之大，無一個國家的富力怎樣雄厚，集中當代及後代的生產力，尚恐不足以制勝，更何況沒有後力來替後代建設。在戰時而籌戰後建設，簡直是與戰時經濟背道而馳的。

拿鐵路來說罷。人人知道鐵路運輸是比較經濟的，西南及西北各省鐵路的缺乏也是一件極可痛惜的事情。在承平時，這些鐵路的建設應列為國家第一要政，到了戰時，算盤的打法就不同了。我們曾計算一條路的土木工程是否能在二三年之內完成，如路線過長，總非二三年所能完成，那就不必動工。其次我們還須記得西南與西北無不製造鋼軌，車頭和車輛，這些材料能從外國購置嗎？如能購置，我們儘得把現在極有限的國際運輸量劃出一部份來，不運軍需品和生活必需品，而運鐵道材料嗎？倘若材料問題不能解決，縱使路基造成，橋梁也鋪架好了，路上無軌，軌上無車，仍無補於抗戰建國。不僅無補，而且有害。因為一而鐵路不成，一面國庫却加發了幾萬萬的鈔票，同時農民本來可以在鄉村生產的，在鐵路上白費了兩三年的時間。這種建設徒增加了戰時的消耗，減少了戰時的生產，促進了戰時通貨的膨脹，和物價的暴漲，是與戰時經濟背道而馳的。這種建設多二份，勝利的可能就少一份。

再就墾務來說罷。有許多人一方面看見墾民很多，另一方面又見

青海，西康，南夏各省，可耕而未耕之地很多，他們就建議大規模的墾，以為此一舉既可救濟墾民，又儲大量的糧食生產，似乎是當前最急之務。實則，這個問題不是這樣簡單的。第一，墾民當中很少是農民，他們不能種地，而且不願種地。直到現在，在墾地各省小規模的墾墾失敗的多，成功的少。第二，運輸問題太困難。假使我們不用墾民，假使我們從河南運一萬個年壯力強農民，運送到青海去開墾，又假使青海某處有一大塊肥沃之地正等待一萬農民去開墾，那末，這一萬人怎樣去呢？他們到了墾區以後，第一季收穫以前，他們的住宿問題，衣食問題，耕牛，耕具，種種問題如何解決呢？墾荒不比種熟，第一年的工作不能有剩餘可以給內地，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才有剩餘可言，那時這些剩餘又將怎樣運到內地來呢？糧食沒有資格坐汽車，因此，湖南瀘湖各縣的米，今年春天不能運到廣東東江去救那裏的米荒。將來邊遠省份的剩餘糧食又能飛到內地來嗎？大規模的墾墾是極長期投資事業，在我國近代史上，開發邊省的成績當以東三省為最可觀，我們試問何以漢人經營東北直到三四十年以前，總是限於遼河流域？何以最近三四十年之內，人民自動的到關外去謀生的有如此之多呢？根據東北的經驗，我們可以斷定，邊遠省份的開發必須以鐵路為先鋒。有了鐵路不待政府的督促，人民必去尋找生活較好的機會；沒有鐵路，政府的督促都是白費事的。假使我們不顧這種條件，貿然從事於大規模的墾墾，其結果又將如上文所談戰時建設一樣，徒增加了戰時的消耗，減少了戰時的生產，促進了戰時通貨的膨脹，和物價的飛漲。戰時移墾也是與戰時經濟背道而馳的。至於森林的培植，到了戰時，更屬緩不濟急。

總之，戰時建設第一必須顧到時間。目前的抗戰如成功，民族自有前途，否則建設都是白費事的。

第二，戰時的建設，必須能增加生產，或有補於軍事；倘不然，即使能於短期內成功，亦不應該舉辦。因此之故，所謂文化建設，戰時建設，到了作戰時期，均不能不格外慎重。在別的國家，文化事業在戰時自然的緊縮或停辦，因為文化人尚不參加前方作戰，就在後方生

至於行政制度的改革，其效果能於目前發生者，似即行政機關和經費的增加而已，其他則不能不少待。文化與政制，正因其為民族百年計，稍遲一二年亦無妨，至於抗戰，則是無法擱置的。

六 經濟作戰亦不可與戰時經濟背道而馳

經濟作戰與軍事作戰都是攻打敵人的，所不同者目標。經濟作戰拿敵人的資源，商場貨幣和金錢為目標，其目的在削弱敵人的經濟力破壞敵人的戰時經濟；軍事作戰則以敵人的軍隊，軍器及軍事要塞或陣地為目標，以求消滅其武力。直接目標及所用的攻打方法雖不同，最後目的是一致的。所以交戰的國家必同時推行經濟作戰與軍事作戰。

經濟作戰主要的利器是封鎖敵國。封鎖的效力是由兩種元素決定：第一是封鎖嚴密的程度，第二是被封鎖者的經濟自足與自給程度。現代的國家，無論其資源怎樣豐富，沒有一國是完全能自給自足的，倘封鎖能嚴密，被封鎖者總要受幾分的影響。從國內富源着想，日本，德國，英倫，義大利最易受封鎖打擊的；美蘇兩國是最不怕封鎖的；中國可說是在兩者之間。至於封鎖的鬆緊，其關鍵不在封鎖線的長短；而在國際交通的截斷。已往，封鎖的職務全歸海軍，所以經濟封鎖在歷史上總是海軍國專有的利器，現在空軍也成了封鎖的工具，德國空軍轟炸英國海上的船隻，就是封鎖英國的一種企圖。

我們現在對日經濟作戰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查禁敵貨，二是禁止查禁敵貨。查禁敵貨實際就是封鎖以前所辦的日貨，目的在使敵人不能在中日推銷商品。禁止查禁日貨在使敵人不能收購淪陷區域的物資。

從戰時經濟的立場來評斷經濟作戰，我們發現有兩個準則必須遵守。第一，我們必須計算敵我損失的比較，這種計算也是軍事作戰所必需的。假使我們以三百萬軍隊抵日本的一百萬軍隊，如傷亡的比例是我三彼一，雙方無勝負可言；如傷亡比例是我三彼二，在我們方面是算贏的。在經濟戰上日本現以百萬萬的預算，來對我們的四十萬萬，

我們如以一元的損失來換取敵人一圓的損失，那我們是不合算的，我們最低限度應該以一元換取二圓半。

第二，在經濟作戰之中，封鎖國與被封鎖國的地位不同，所用的策略亦因之而異。被封鎖國所憂慮的是軍需品的缺乏，封鎖國的第一企圖，就是要使被封鎖者缺乏軍需品和生活必需品。被封鎖者應該設法破壞封鎖，以期能從國外購置軍需品和生活必需品。被封鎖者對於外國貨物不能分友敵，只能分必需與奢侈品。如係奢侈品，縱使來自友邦，必須禁止；如係必需品，縱使來自敵國，亦所歡迎。譬如說在英國封鎖德國，德國所缺乏各種物品之中有汽油與棉花，假使英國商人願意把汽油和棉花或紗布賣給德國，全德國找不出這樣的一個糊塗蟲，會說：「這是敵貨不買」。從德國人看來，能輸進外國汽油和紗布者，不問其來源如何，既是愛國商人。英國人如願賣敵，德國絕不拒絕。如英國有好商或富商願意破壞英國對德國的封鎖，德國人又何苦要幫助英國封鎖德國呢？我們在抗戰以前，反日的策略注重排斥日貨，逐漸的變成風氣，以不買日貨為光榮，這是很正當的。那時我們不必買日貨，因為我們可以買國貨或友邦的貨物。現在的情形大變。現在如敵人願以各種必需品賣我，如汽油，紗布，五金，藥品，及工業原料品等，我們那能拒絕？倘若拒絕，那我們不啻加緊敵人的封鎖政策，這就是與戰時經濟背道而馳了。

抗戰以來，士大夫根據我國傳統的輕視商人觀念，總是護罵商人，殊不知商人對於抗戰會有很大的貢獻，或者比士大夫階級的貢獻還要大些。倘若沒有商人冒險到外埠去買貨，現在國內紗布，五金，藥品，價格還要高出很多。有一次，某友邦駐華的外交代表，對我說：「我從安南進貨兩時，看見有許多千百成羣的走私者，在邊境上運汽油進來，據我看來，這般走私者，是真正愛國份子，在你們中間提倡統制汽油輸入者大有人在，你要小心，我恐怕這些人是漢奸，故意破壞你們的戰時經濟」。

據我看來，我們的戰時經濟為漢奸所破壞者倒不多，為感情用事，只求一時痛快的人所破壞者，則恐不少。（完）

兩種文學觀

梁實秋

奇聞寄所引烏衣佳話一則云：「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羨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短，接灘拋下，漱水醒，相逢便倚簾波浦，更唱菱歌勞海艇。」鄭谷云：「白頭波上日頭翁，家逐流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卞戶部（華伯榮）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是一絲輕，浪花深處魚如舞，只爲心安不費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煙淡抹痕，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漁人。」某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落日江頭未滿罾，回棹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濕鬚鬢。」唐子長云：「朱門公子饌鮮鱗，華說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潭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兩笠風簑不負身，三尺銀絲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憫其苦也。屬意雖不同，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

漁人，正和其他職業中人一樣，生活有苦有樂。故羨其樂與憫其苦，均不失爲他們生活中的一面的寫照。這其間原無爭執。但若把這兩派的詩所代表的意識引出來，則顯然可見作者的態度（即文學觀）是截然不同。一派是理想主義者，一派是寫實主義者。詩人所羨之樂，漁人未必能夠感到。一幅「寒江釣魚圖」當然十分清雅，一葉扁舟，上面坐着披簑戴笠的老漁翁，近處是幾片疏落的蘆荻，遠處是一抹斜陽，旁邊伸出秋樹的枯樹枝，淡曠的天空襯着一排寒鴉……假如詩人想像着自己是那漁翁，當然會覺得雅人深致，十分的體會那山水之樂；但漁人自己却不見得能夠流連山水，享此清福，他心中繫繞着的怕是魚牙的買賣，家裏的柴米油鹽，以及苛酷的魚稅之類。詩人所憫之苦，卻不見得就說盡漁人的苦處，一個「憫」字就代表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就難免隔靴搔癢，不過究竟還算是道出了漁人的一些心事。寫漁人詩不過是一個例。一切文學大概都不外乎兩個趨向：一個

是逼近人生，一個是逃避現實。逃避現實者偏重藝術，講求音詞藻飾，以「意境高絕」爲極。其實，所謂「意境高絕」即與實際人生相離甚遠之謂。逼近人生者取材於實際生活，客觀的描畫人之喜怒哀樂，而以「動人」爲極。這是兩種態度，雖然我們不必指定某一作家一定屬於哪一派，因爲一個作家的態度不一定就是固定不變的，亦不必指定某一作品一定屬於哪一派，因爲一個作品的內容也往往是相當複雜的。不過兩種態度是顯而易見，輕重倚捨之間，我們常常可以指點出來。

從上面兩派漁人的諸作裏，我們還可以看出有趨向的一點：即文學與其他藝術的關係。在一幅漁翁垂釣的圖畫上題詩，與其題寫其風波之苦的詩，還不如寫羨其山水之樂的詩。何以故？圖畫與文字，對象不同，方法亦異。西洋畫講究線條，色彩，佈局，中國畫講究筆墨，筆韻，意蘊——都是用靈活的技巧與手法來表現一個景象。這景象，大體講來，是與實際人生無大關係。因此，一幅靜物寫生和一幅「沙汀雁雁圖」確是沒有多大的人生意味，而一幅「窮樂圖」和一幅「耕織圖」則又不能不說顯露人生意味。但無論如何，圖畫注意的「美」，其正常用意不在使人聯想圖畫所暗示的意義，而在使人欣賞其「美」。文學則不然。文學的對象是實際人生中的喜怒哀樂的情節，文字僅是一種符號，藉以表達思想情感，文學的手法是否爲「美」僅是次要條件，主要條件乃在描寫逼真，誠摯動人。是故文學家宜有悲天憫人之懷，而其中逃避現實之一派則較爲接近藝術家，或則注重意境之美，或則注重山水清奇之趣，或則注重音樂之美，字辭句酌以求聲調之鏗鏘。此種作風，可備一格，但均不是文學的正則。

文學要逼近人生，這一種文學觀是正確的，但又不必即流爲宣傳，窮之文學亦未曾不可講究意境與音調，但又不必過分偏重，以至成爲逃避現實。

英國何以在作戰

傅築夫

Why Britain is at War By Harold

Nicholson Penguin Books Ltd, 1940

著者尼柯森是位具有文學天才的名外交家，他的父親也曾任過駐俄及駐西班牙大使。巴黎和會之時，著者參加英代表團，並為凡爾賽條約起草人之一，一九三五年始棄外交生涯，轉入下議院為工黨議員。他這一本小書是以外交家的經驗，文學家的筆筆，赤裸裸地寫出此次大戰之由來，流露了許多外交界的内幕情節，並很坦白地指出了英國政策的錯誤，及其作戰目的。

希特勒是這次大戰中的主動者，所以著者首先解剖希特勒——從其流浪街頭以至榮任元首。這一段的敘述雖很簡短，却使我們明白認識了這一個怪傑的成功經過，及其思想和性格。

在過去數年之中，英國的對外政策一貫地錯誤，推本窮源，是因英國朝野對於希特勒之為人根本缺乏瞭解。他們沒有著者那樣動腦，肯從最早原形「我的奮鬥」中去窺探希特勒的抱負與野心。他們只讀了些虛假修改的英文譯本！他們發現了希特勒的口氣頗與自己脾胃不合，而勢力持鎮靜，以為這不過是個「奇怪的小傢伙」在發瘋話，不妨一笑置之。邱吉爾雖曾一再警告，大家却只當他神經錯亂，故意危言聳聽！

甚至有人誤認希特勒的基本政策是親英而反蘇。三）如果有問題，那一定是向東面爆發！（頁三）希特勒也故意放出了許多反共姿態，以反共來作誘餌推遲他的陰謀的烟幕。第一幕是奪取萊茵地帶（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第二幕是併吞奧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第三幕是由簽訂慕尼黑協定（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以至佔領捷克（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最後一幕便是進犯波蘭（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著者告訴我們這幾次事變的經過及其內幕，其設計之巧，手段之辣，莫不是無先例的。希特勒老是「先選定了犧牲的對象，隨即以口頭或條約的保證給予對方，使之不加防備，然後於適當時機突然佔據對方的軍事要點，使之無法抵抗，同時即向世界說明這已是他最後一次的冒險。

但是直到英國宣戰時止，希特勒所掠奪的土地沒有一塊是英國的，英國為什麼要對德作戰？而且英國於慕尼黑會議之時，既已不惜犧牲了自己的榮譽，犧牲了友邦的獨立，乃至犧牲了電要

的軍略要點，以去遷就希特勒，何以捷克被佔之後，忽又放棄緩靖政策而決定作戰呢？

據著者說，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是一和平而又安詳的民族，只有兩種感情同時被激盪了起來，他們才肯訴諸武力。那兩種感情便是恐懼與憤怒。恐懼是為保持生存的本能；安詳則為悠久的傳統道德所形成。這兩種感情苟非同時被觸起來，交相激盪，他們不會拚命。自從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當權時起直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捷克滅亡時止，這兩種感情沒有同時被激盪過。過去雖有一部分英威人，對於希特勒的行爲感覺恐懼，但不憤怒；另一部分雖感憤怒，却不恐懼。一直等到三月十五日的事件發生，這兩種感情相合而為一（頁一〇二）。

在此以前，英國的輿論是苟安的，他們總以為希特勒的野心和貪慾，也有相當止境，「分出一點利益來使他滿足，未嘗不可以使一個野獸變為馴順」（頁一〇三）。

張伯倫就在這輿論之下，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可惜希特勒不肯適可而止，很不智地把它撕破，遂將英國人的幻夢驚醒，而使他們立刻感覺到這老虎並不專吃牛羊狗犬，還要闖進家園裏來吃人。「希特勒是要出來搶劫了」（頁二〇五），他們最後才發現。

因為英倫是一島國，它的食物和原料完全仰給於海外，而其殖民地又是散在各方，一旦交通被敵切斷，其勢必極危險，所以二百五十年來，英國人從本館上感覺出他們的安全是建築在歐洲大陸及海上交通不絕由任何一個強國來控制這一點上，過去它和西班牙，荷蘭，路易十四，拿

破壞第一，威爾遜第二等所進行的戰爭，都是爲了這一點。其於此種本能而產生的外交政策，有人稱之爲維持列強均勢，也有人稱之爲保護小國利益。現在希特勒橫行歐洲大陸，各小國相繼淪亡，萬一英國的艦隊再失掉了控制海洋的能力，那末，大英帝國的命運如何，只有仰賴於希特勒的慈悲了！

因爲自私的生存恐懼，融入了道德的憤怒之中，英國人才不惜犧牲一切，實行作戰。著者說，英國今日「不僅爲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而戰，不僅爲了摧毀一種無制度而戰，而猶想創設一

個武裝的和平世界，以使德國不能報復，又不致威爾遜避意見，造成一個正當的和平世界，以他主張積極集體安全制度，並以新組織的歐洲聯邦來替代國聯。

個新的世界，以使這一種罪惡不再發生」(頁一 二〇)。

著者很坦白地承認英國過去之錯誤，同時也不抹煞敵人的長處，更不拒絕他們的正當申訴。他雖是個凡爾賽條約的起草人，却不諱言這條約裏面就隱伏着許多後來糾紛之種子。據他說，這條約的缺點，是在既不遵照法國提議，造成

先決定所要創造的是何種世界。最好是先締結正式和約以前，先訂一個初步條約，確定原則。至於正式條約，則應俟於交戰國人民須腦冷靜之後，始行談判；其談判地點亦應選免交戰國首都之一。會議自當絕對公開，更應准許戰敗國派代表出席。分裂德國之說，著者反對甚烈，他主張積極集體安全制度，並以新組織的歐洲聯邦來替代國聯。

德義日三國協定與中日戰局之前途

(上接第四頁)

多年以來去繼續到聯合一致而行動。在現時情況之下，英美一致的行動爲解決東亞問題先決條件之一。英美在歐洲之行動，在今次歐戰中法國屈服之後，早已趨於一致。德義日協定一經宣佈，英美之一致合作遂由歐洲而及於遠東，而以世界爲其範圍。中國方面吾人素有一種信念，感覺中日問題只是世界問題之一部份，其解決須與世界問題取共同之出路，而中日外交關係最爲短與最爲直接之距離，必須繞道歐美。德義日協定使此種信念實行之可能性大爲加強。蘇聯在東亞之政策，早與中國一致；故蘇聯對日本在事實上亦已與中英美立於同一戰線之上。以上三端，可以說明德義日三國協定已產生一種新國際形勢，使日本在東亞之地位，完全陷於中蘇英美包圍之中。故德義日協定，對東亞局勢與中國抗戰的前途，其重要性超乎任何國際協定之上。

德義日協定間附有秘密條款，使德義向巴爾幹進攻與日本南進，配合策應，則日本與英美之戰勢不能免。若然則日本對中國之方略，在軍事上與外交上皆將有所轉變；證以種種事實與傳聞，此說之可能性甚大。在軍事上，日本爲縮短防線，節省兵力，或將於撤退南甯之後，

亦無法制止。爲免重蹈覆轍，著者主張下次議和時間，應先決定所要創造的是何種世界。最好是先締結正式和約以前，先訂一個初步條約，確定原則。至於正式條約，則應俟於交戰國人民須腦冷靜之後，始行談判；其談判地點亦應選免交戰國首都之一。會議自當絕對公開，更應准許戰敗國派代表出席。分裂德國之說，著者反對甚烈，他主張積極集體安全制度，並以新組織的歐洲聯邦來替代國聯。

繼之以宜沙甚或武漢之撤退。皆意中事；但江浙與華北及粵南則必不放棄。在外交上，日本或於不犧牲其政治優勢之基本原則之下，提出較前寬鬆之條件，附以種種滑稽條款，如取消汪精衛組織之類，以求和平而免後顧之慮。但自中國觀之，凡此種種，無論其爲軍事的或外交的，概屬細末之枝節問題。中國在已往或有採取某種方式以冀得喘息機會之必要；但在今日則因德義日協定所造成之國際局勢，此種必要已不存在，而當企圖貫徹對日之基本國策，即根本肅清日本在東亞之政治優勢。中國此後在軍事上及外交上之舉措，必以此基本國策爲標準加以判斷，亦必能能夠達到此項目的，方可認爲圓滿。此項目的一日不達，則建國之工作，終必受其牽掣。而欲達到此項目的，中國勢必須與英美等國取同一之步驟，享同一之命運，存則俱存，亡則俱亡。德義日協定所給予中國之機會，千載難逢；吾人必須充分了解其重要性，並以自動之精神，靈活之手腕，盡量利用此種機會，以達到推翻日本政治優勢之目的。就中國言，英日同盟所造成之國際局勢，亦將以德義日協定而告結束；而德義日協定亦將爲新中國與新國際局勢之開始。

繼之以宜沙甚或武漢之撤退。皆意中事；但江浙與華北及粵南則必不放棄。在外交上，日本或於不犧牲其政治優勢之基本原則之下，提出較前寬鬆之條件，附以種種滑稽條款，如取消汪精衛組織之類，以求和平而免後顧之慮。但自中國觀之，凡此種種，無論其爲軍事的或外交的，概屬細末之枝節問題。中國在已往或有採取某種方式以冀得喘息機會之必要；但在今日則因德義日協定所造成之國際局勢，此種必要已不存在，而當企圖貫徹對日之基本國策，即根本肅清日本在東亞之政治優勢。中國此後在軍事上及外交上之舉措，必以此基本國策爲標準加以判斷，亦必能能夠達到此項目的，方可認爲圓滿。此項目的一日不達，則建國之工作，終必受其牽掣。而欲達到此項目的，中國勢必須與英美等國取同一之步驟，享同一之命運，存則俱存，亡則俱亡。德義日協定所給予中國之機會，千載難逢；吾人必須充分了解其重要性，並以自動之精神，靈活之手腕，盡量利用此種機會，以達到推翻日本政治優勢之目的。就中國言，英日同盟所造成之國際局勢，亦將以德義日協定而告結束；而德義日協定亦將爲新中國與新國際局勢之開始。

別人的職業

味 橄

俗語說：「老婆是人家好」，其實職業又何嘗不是這樣。我從來沒有聽見有人對於他自己的職業表示滿意的。無論他的位置如何高貴，他的職務如何清閑，他的生活如何舒適，當你問到本人時，他總是說沒有什麼好，不是太忙，就是太閑，不是沒有發展，就是沒有興趣，他總可以說出一大堆使他滿意的理由來，雖然他的職業，在我們看來，是沒有一點什麼可嗚不平的。甚至一個人的地位，到了寫王的程度，可以說不能再好，然而當你表示羨慕他時，他就會用顯赫赫緊着「一把刀，懸在你的頭上來嚇你，使你不致對於他的職位，再說半個好字。地位低固然不滿意，地位高也不滿意，薪俸薄的固然要訴苦，薪俸大的也同樣要訴苦。

反轉來，別人的職業，總是可羨慕的。普通人羨慕做官的有勢力，做官的又羨慕普通人的自由；商人羨慕士子的文筆，士子又羨慕商人的金錢。甚至窮得要討飯為生的乞丐，都有人羨慕他那無事無掛的生活。

如果職業可以自由改變的話，人們一定會不斷地更換職業。人人都想拋棄他固有的職業，去換一個新的。彷彿只要是他未曾做過的事，他都願去做似的；因為別的無論什麼事，都似乎比他目前的事要好些。

一個未入社會做過事的青年，在選擇他將來

的職業的時候，是踴躍躊躇的。尤其是在他人大學或專科學校之前，他得決定他的志願，學文還是學工？學商還是學農？學醫還是學法？學政治還是學法律？學教育還是學哲學？學美術還是學音樂？門類繁多，到底不曉得學那一門好，而那些看去又似乎門門都是可羨慕的職業。

有些人索性自己不定，一憑父母之命去學習。其中聰明的父母，常是依照兒子的性情去代他選擇；有的父母就只求意志有人，勸令兒子去學他們自己的專門；還有些父母既不求意志，也不依性情，而只看那世間的需要，什麼出錢最好，就教兒子去學什麼。其實這倒是最切實的辦法。我個人就反對前兩種主張，我不喜歡一家人學一樣的東西。至於所謂性之所近，其實也不盡然。只要你每天去攻讀而加以研究，無論什麼都可以使你發生興趣。興趣不是天生的，而是由於時常接近而來的。

我個人選擇職業的經過，是最簡單沒有什麼了。那時我正十八歲，因為從小和一些驕人混在一塊兒，接近的都是書畫一類的藝術，論嗜好我是學美術的，然而家裏沒有錢讓我自費去學專門，我必得考取一名官費，才有機會升學。不幸官費中沒有美術一項，即有我也不一定考得取，於是乎問題就很容易被解決了。第一就是

要考取公費，考取了那一科，就學那一科，自己用不着去決定，也無補決定。

第一次考公費時，我的志願是什麼，現在完全忘記了。第二次考公費的工業學校，志願是理學科，可是數學使我失敗了。第三個機會就是學師範，我雖不大願意，看在公費的面面上，還是報名去投考；發出榜來，居然考取，於是我的職業，就是這樣決定了。一個運命注定的教育匠！

在當時規定的公費學校中，還剩得有一個醫學院，我未嘗不可以再去試試運氣，不過因為我的大哥哥已經在我以前去學習了，所以我就不能再利用那個最後的機會。

高等師範畢業出來，到中學去教書是天經地義，我當然不會獨在例外。這時我已有了「一個職業，而仇視那種職業的心思，便是相與俱來，幾乎是從開始教書的那一天起，我就討厭教書，尤其討厭教英文。同為一個教師，我却羨慕別人的，雖同樣有文卷要改，我仍然覺得他比我好，因為中國學生寫中文，無論如何比英文要寫得通一點，總可以勉強通達，而能表示一點思想，不像英文卷子，直同天書符咒，使人莫測其妙。我覺得英文教師是在一切教師中最無味的了。然而這職業是運命注定的了。你不能改行，別人也不讓你改行。你去謀事，別人得先審查你的資格，查問你的出身，既是學師範的，他們當然要請你去教書，別的職務決輪不到你這外行來幹。

我人社會之初，是以教育為職業，而頗寄情於寫文章，把興趣的中心放在副業上的。二年

就是這樣的過去了。一個社會的大革命隨着到

來，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和被改變，我也就隨着國民

革命軍打到武漢的時候投筆從戎。想不到我那

運命注定的教育職業，就是這樣輕易地告一段

落。傳統既已打破，我那固定職業的枷鎖也就

隨之解放，從此以後，我便得了自由選擇職業的

權利。我的經驗主義，便開始活動起來。什麼

職業我都想去試試，而我實際也就是那樣做了。

拋棄了教鞭，我便走到軍部裏去替人草擬命

令。隨着節節勝利的大軍前進，是很夠味的。

可是到了大將劉宗華袍，只帶着幾個護身的士卒

黑夜逃走，那危險和艱難也就夠受了。我離開

軍隊之後，竟混到官場中去，至今還留下一顆「

風雨鳩江一月官」的小印。紀念着那一段浮沉，

傳記着當時的殘夢。

最後我覺得文人之筆，還是勝過武人之刀，

所以委棄一切野心，到上海去度隱居生活，滿以

爲今生就可以在這種生活方式之下，不種地度

過。想不到事隔十年，如今又來重理舊業！

難道這是運命注定的教育匠嗎？一個人身

的職業難道真是在考取學校的第一天就決定了的

嗎？

不過我在外面兜了一個圈子回來，發見什麼

職業都是一樣，有它的好處，同時也必定有它的

壞處，現在我倒並不那樹討厭我自己的職業了。

經驗告訴我，世界上並沒有一種完全滿意的職

業，無論什麼職業，你在表面上看去，總是可羨

慕的，直到你自己身歷其境，便一變而爲可憎可

厭的了。那原因很簡單，對於別人的職業，你

只看見它的好處，看不見它的壞處，而對於自己

的職業，你把它所有的壞處都發見出來，好以自

然被掩蓋了。

職業到了大學教授，正不知有多少人羨慕

習，如果我現在還要把它的好處一一臚列出來，

別人一定罵我不知滿足。憑良心說一句，只

要每月的薪俸，能夠按期發下，不打折扣，當大

學教授，地位既相當的高，環境又便於治學，各

方面都過得去，何必再去羨慕別人的職業？自己

的職業是握在手裏的，別人的職業，並不一定能

謀得到，而且一山望見一山高，謀到了此，又還

有彼，別處的職業是謀不盡的。人生苦短，不

如滿足於現在罷！

第五戰區四月之捷奉李司令

長官德鄰

王陸一

熱決奮徽戰，

南風大夢時。

軍有新祖國。

敵皆用全師。

故便長圍合。

旋度十道馳。

荆襄乘勝地。

濃綠上兵旗。

到底是什麼線

我接讀新華日報社論。受了我的影響，

張嬌和李大爺也愛讀新華日報社論。

從雙十節起，我就讀到了許多雜題，那天下

午，張嬌先來發問：「第四段末有被略二字，第

五段中也有被略二字，各加括弧，是何意義？」

我說：「查字典去！」

第二天，十月十一日，李大爺來問：「第六

和第八兩段，各加加上括弧的被略二字，是何意

義？」我說：「問張嬌去！」

第三天，十月十二日，形勢嚴重起來了，張

嬌和李大爺同時來說：「今天第五第六兩段之被

各有被略一段四字，也各加上括弧，究竟是何意

義？」我笑了，只得無賴地說：「你敢懷疑新

華日報的社論裏面還有錯字！」

張嬌是個動輒就喊「騎驢圍結」的女僕，

得她和李大爺已把主人作擁護了，再說下去，也

要逼我把她們一律辭掉，假裝滿意而去；李大爺

自然隨着她的「和平陣線」。

十三和十五兩日，被略二字又所觸我眼簾，

然而沒有人來問。一場風波，總算平息。

然而事出人意料者，過了兩星期後，和平
 報，一雙手執尺，指著當日新華日報社論第五段
 第三第四兩行而說：「足有四吋長的瓜子點！」
 「不是瓜子點」，我糾正她說。

十一月五日，李大爺來說：「張燾已量過，
 約有」又四分之一吋長的「芝麻點」。「不是芝麻
 點」，我又糾正他說。

- 十一月六日一吋長。
- 十一月八日八吋半長。
- 十一月十一日四吋長。
- 十一月十六日五吋長。
- 十一月十七日三吋多長。
- 十一月二十日又約五吋長。

張李輪班報告，輪班問難，我爲一勞永逸
 起見，乃請一位頭腦頂頂清楚的數學家來代我回
 答。數學家一到，問明原委，便喚喚李說話。
 以下便是他們三方面的談話紀錄：

數學家：「這是點，這是線？」
 李大爺：「張燾老說點，我疑心是線」。
 數學家：「什麼線？想好了才說！」
 李大爺：「莫非是人民陣線」
 張燾搶著說：「也許是統一戰線」。
 數學家：「你們說的都有意義，但我則稱之
 爲「虛線」」。
 線之討論，尙未完畢，忙於寫稿，姑錄至
 此，以補空白。(英)

最後的補白

編者

總編日三國同盟成立以後，國人對它未嘗不
 注意，卻沒有明白認識它的意義，有許多在別方
 而向具遠見的人物，自知國力薄弱，不足以多樹
 勁敵，希圖觀望而不行險，這對於德滿兩國抱着一
 種失寵婦人不忍拋棄她的已有外遇的無良本夫之
 心理，不捨得一刀兩斷，脫離得割割裂裂。中
 國人之重情重誼於此益顯。我是中國人之一，
 我很瞭解這種高過一切的犧牲精神與強悍鎮靜的
 自慰心理，我只憂慮悲劇之演出不過遲緩數日，
 到底終是不免！我感覺苦悶！我感覺孤單！

反過來說，有許多血氣方剛的少年，同情於
 這被棄的主母，憐恤她和本夫斷絕，急爭人格。
 我佩服他們的勇敢與正義感。然而那位不幸
 主母的過去遭遇，已夠可憐，在末預先幫她安謀
 出路之前，就硬硬地逃出那個風雨飄搖的家庭，
 到破爛寒去尋求托庇，舉動也太魯莽，結局亦恐
 未必怎樣樂觀！

無論對外與對內，國策都宜從速決定，這是
 誰也不便否認的。然而多刺的藩籬，委實不易
 揮掃。在野人情報不週，伸手更不容易。在
 本期中，武大教授吳之椿和中教授張運文兩先
 生也在無意中做了一種合作事業，給我們指出對
 外與對內的出路所在。張先生是少壯派，說話

比較上爽快一點，然而他的基本立場是可上對
 總理在天之靈的。惟是他的文章，顯然沒有寫
 完。爽在戰時改良塊錢，關於人口統計，選民登
 記，以及實行選舉，不是沒有它的困難！又在論
 陷區外，我們尙有大塊土地，實爲中央政令所不
 及，形成一種古離古怪的局面，張先生有何善法
 以使之成範？在不久的未來，我們希望張先生
 再給我們一個解答。

蔣廷黻先生的經濟論是發完了。我們佩服
 他的敢說實話。
 梁實秋先生的兩種文學觀，雖非實力之作，
 却于青年作家以正確指示。爲數固不在多言，
 爲文亦然，梁先生是不肯故意拉長文章以示博識
 多聞的。然而梁先生確是博識多聞者。
 傅樂夫先生勤謹好學，意思深遠，向爲編者
 所最愛讀的作者之一。他這一篇書評，寫得多
 麼清晰！

武漢大學的外國文學系教授，似乎都可以到
 中國文學系去兼課的。上期是陳邁伯，這期是
 錢歌川，以後當然還有一批一方重浪，陳登恪，
 費繼照，謝文炳，袁蘭紫，朱孟實，乃至李娜與
 楊安婉瑤瑤！